

土耳其中左政党的生成逻辑、政治实践 及现实困境

——以共和人民党为主线*

李艳枝 吕 宏

内容提要 中左政党是土耳其政党政治的重要参与者，共和人民党是典型代表。社会经济变革和社会阶层群体结构的变化为中左政党兴起提供了经济和社会基础，国内政治变革推动其意识形态的萌芽，1961年宪法为其提供重要制度保障，左右翼力量激烈斗争为其提供催化剂，国内外局势变化促使世俗精英政党向中左政党转变。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左政党经历从蓬勃发展主导国家政权，到分裂重组与角逐国家政权的演变，意识形态变化使其经历民族主义政党、社会民主政党和全能型政党的转变。身份政治带来族裔、教派和妇女立场变化动摇了中左政党的社会基础，党内民主不充分、权力斗争与腐败问题影响了中左政党的政治效能发挥，民粹主义与代议制民主的相互拒斥削弱了中左政党的内在张力，这给土耳其政治发展带来不确定性。

关键词 政党政治 土耳其 中左政党 共和人民党 埃杰维特

作者简介 李艳枝，辽宁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吕宏，辽宁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若从政治光谱分析，土耳其政党政治呈现左右意识形态的分野。多党民主制启动以来，共和人民党^①与其分裂、衍生而来的社会民主平民党、民主左翼党等中左政党一起成为政党政治的重要参与者。20世纪70年代，比伦特·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伊斯兰教视域下的宗教对话资料整理与研究”（18ZDA234）、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土耳其民族问题研究”（2020-GMF-008）、辽宁省“兴辽英才计划”项目“土耳其民族宗教问题及其对我国的启示研究”（XLYC2004007）的阶段性成果。

① 共和人民党于1923年建立，开启了土耳其政党政治进程。

埃杰维特（Bülent Ecevit）出版的《中左——土耳其的一种政治思想》中，确定共和人民党的中左意识形态定位，表明它从民族主义政党向中左政党的转变。此间，共和人民党先后三次参与组建联合政府，并以“民主左翼”政党身份加入社会党国际。20世纪80年代后，中左立场的社会民主平民党、民主左翼党和共和人民党积极参与议会选举，成为土耳其政坛的重要力量。进入21世纪以来，中左政党呈现分化趋势，共和人民党作为主要反对党挑战正义与发展党的“选举霸权”，逐步呈现全能型政党^①的特征；民主左翼党则逐渐趋于式微。本文基于土耳其政党政治的历史演变，聚焦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共和人民党，探究中左政党的生成逻辑、意识形态演变和政治实践，阐释其发展困境、存在问题及其对国家治理的影响，从而揭示土耳其政党制度的内在问题及其对政治发展的深远影响。

一 土耳其中左政党的生成逻辑

二战后尤其是冷战时代的开启，世界经历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中左政治取向相伴土耳其政党政治思潮演变应运而生。该国中左政党的产生，既基于国内中下层社会团体力量的支持，又是国内政治变革的产物，还与外部国际政治环境密不可分，其中国内政治的发展变化是主因。

（一）土耳其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社会分化为中左政党兴起提供社会基础

首先，社会阶层群体结构的变化促使工人、下层民众和农民成为共和人民党的新支持基础。土耳其从国家主义向进口替代经济模式的转变促使社会分化。20世纪30年代的国家主义政策^②，既为凯末尔政权提供经济保障，也促进工人阶级形成。多党民主制启动后，土耳其逐步推行国家主导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社会分化加剧。1961年，埃杰维特当选劳动部部长后，通过立法加强工人结社权、承认工人罢工权，并在任期内通过《社会保险法》（the Social Insurance Act），将工人保险转变为社会保险，提高工人社会保障权

^① 全能型政党又称全方位政党，其功能和形态是全方位的领导，权力包揽既是这种领导功能的主要内容，也是通过领导的方式来实施和实现的。参见孙津：《政党分类的依据及其普适性——兼论领导党和参政党》，载《中国政协理论》2012年第23期，第54页。

^② 参见李鑫均：《凯末尔时代土耳其经济发展的“国家主义”》，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0年第6期，第44~65页。

益。尽管在1965年议会选举中，共和人民党因为与军方关系密切遭遇选举失败，但埃杰维特仍因其赋予罢工合法化和其他保障工人权利的行为而被视为工人阶级的英雄。^① 埃杰维特将实现社会民主政治的希望寄予工人活动，将实现西方式民主看作工人阶级长期浴血斗争的结果。^②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而形成规模庞大的棚户区。经济的急剧增长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打破了土耳其原有的社会生活秩序，贫富差距的扩大引发城市下层民众对政府不满，宣称实现社会民主公正和福利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对城市下层民众具有巨大吸引力。共和人民党转向中左政党过程中，工人阶级和城市边缘棚户区居民的支持率显著增加。农业发展强化了共和人民党社会改革方案在农村的吸引力，土地改革和对社会平等、社会公平、社会安全、集会罢工权以及改善农民条件的允诺，使共和人民党在1973年大选中获得巨大胜利，其中多数选票来自农村和城市下层民众。^③

其次，现代化进程推动城市中产阶级、阿拉维派以及妇女组织的发展，他们成为中左政党的重要支持力量。二战后，由教师、政府官员以及知识分子组成的中产阶级要求实现社会福利平等、加快文化改革、广泛提高识字率和推动世俗主义，支持民主议会制度，成为共和人民党的坚定支持者。因坚持凯末尔主义的认同基础，阿拉维派是左翼政党的强有力支持者。从乡村向城市移民、民众教育水平和政治参与度的提高，使阿拉维派产生强烈的文化权利诉求，诸多左翼政党设立针对阿拉维派的专门委员会，获得阿拉维派信任，共和人民党获得双倍选票的所有省份都集中在阿拉维派人口较多的埃尔津詹、哈塔伊以及通杰利省^④。阿拉维派基于意识形态趋近，选择与支持中左政党反映其政治诉求，其政治立场具有宗教派别和意识形态的双重驱动因素。另外，共和人民党致力于提高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生活参与度，打破日常生活和公共场合的性别隔离传统，得到妇女群体的支持。20世纪50年代以来，共和人民党积极寻求在党内和政治领域中赋予妇女权力，在

^① Yunns Emre, *The Emergence of Social Democracy in Turkey: The Left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epublican People's Party*, London · New York: I. B. Tauris, 2014, p. 111.

^② Ibid., pp. 114 - 117.

^③ Ceyda Dibek Esmâ, *Bulent Ecevit: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his Political Views*, Ankara: Bilkent University, 2002, p. 25.

^④ Ayşe - Güneş Ayata, "The Republican People's Party", in Barry Rubin & Metin Heper eds., *Political Parties in Turkey*, London: Frank Cass, 2002, p. 107.

各地方执行委员会中设立妇女代表席位，地方妇女组织构成中左政党重要的外围组织。20世纪70年代，共和人民党趋向中左意识形态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新政党组织时，党内女性成员走访各地并进行门对门的拉票活动，实现在民选机构诸如议会和市政委员会中扩大妇女代表份额的政治目标。^①由此，正如一些学者所言，土耳其中左政党的支持者主要来自发达的西部城市，接受世俗教育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阿拉维派组织成员和妇女。^②

（二）土耳其国内政治变革推动中左政党意识形态的萌芽

首先，民主党政府的高压政治促使共和人民党积极寻求政治出路。民主党上台后，着力剥夺和限制共和人民党在一党制时期获得的权力。^③这迫使共和人民党告别一党制时期的威权主义、精英主义政治形象，寻求新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纲领。伊诺努领导的共和人民党采取如下措施：一是建立团支部吸纳青年知识分子；二是吸纳自由党成员加入，囊括《论坛》杂志成员等进步知识分子；三是成立调查与文档局（the Bureau of Research and Documentation），关注经济发展、社会问题、民主发展、选举结果、城市和住房问题、工人集会自由和农民问题。^④1957年议会选举之前，共和人民党起草了一项新政治议案，主张给予工会工人罢工权、大学组织独立性以及废除反民主立法，结果在1957年议会选举中，共和人民党的议会席位从31个增加到173个。^⑤1958年，共和人民党进一步修订政治议案，强调实现社会公正和法律至上，甚至提出建立两院制议会和实现比例代表制。该议案构成1960年军事政变后宪法改革的蓝本。^⑥共和人民党面对民主党压制，迎合民众对社会公正和平等的向往，逐步趋于左翼的政治意识形态。

其次，1961年宪法为中左政党产生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共和人民党为代表的中左政党在1961年宪法框架下相对宽松的政

① Sencer Ayata & Ayşe - Güneş Ayata, "The Center - Left Parties in Turkey", *Turkish Studies*, Vol. 8, No. 2, 2007, pp. 221 - 222.

② Ibid., pp. 213 - 214.

③ Kemal H. Karpat, "Political Developments in Turkey, 1950 - 70",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8, No. 3, 1972, p. 352.

④ Yunus Emre, *The Emergence of Social Democracy in Turkey: The Left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epublican People's Party*, pp. 85 - 86.

⑤ Malike Selçuk Sancar, *Social Democracy in Turkey in a Comparative Setting*, Ankara: Bilkent University, Ph. D. Dissertation, 1998, p. 136.

⑥ Ibid., p. 137.

治社会环境中获益。1961年宪法与共和人民党联系密切，筹备宪法的制宪代表会议中有49名共和人民党成员。1961年宪法将土耳其定义为民主的、世俗的、基于人权的国家，倾向于限制行政机构权力，拓展西方式自由与民主的空间；提出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科学自由和广播节目播出自由，实现工人阶级的自由结社权、罢工和集体谈判权合法化。1961年宪法确保土耳其左翼力量成为议会中的合法政治力量。世界各国社会主义文学作品在1961年宪法颁布后传入土耳其，《论坛》《方向》等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期刊发行量一度过万，甚至在知识分子和学生中间掀起社会主义运动浪潮，促使共和人民党的意识形态转变。

再次，国内左右翼力量激烈斗争是中左政党生成的催化剂。1960年土耳其军事政变后，军方领导人明确指出新政权允许社会主义政党存在^①，被压制的左翼力量获得合法生存空间，此时左翼力量包括土耳其工人党、土耳其共产党、《方向》运动等。土耳其工人党在1965年大选中获得15个议会席位，成为议会中第一个合法的马克思主义政党。^②共和人民党采纳“中左”政治话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阻止进步主义者和改革主义者选票向工人党流失，进而弱化左翼力量对共和人民党政治前途的影响。因此，在工人阶级革命意识增长、工人罢工频繁发生的情况下，共和人民党打造其中左身份，并对资本主义体系采取严肃批判的立场，认为后者标志着腐败、剥削、社会不公平以及不平等。^③此时，以正义党为首的中右翼政党对左翼政治力量施以震慑、镇压甚至暴力袭击，共和人民党采纳“中左”政治立场，既能弥补土耳其左翼力量发展不充分的缺陷而在民主化进程中承担社会民主政党角色，又能避免右翼政治力量的质疑和反对。

（三）国际局势变化促进共和人民党从世俗精英政党向中左政党转变

冷战爆发后，土耳其接受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于1950年参加朝鲜战争，1952年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扮演美国的中东盟友和冷战前沿阵地角色。但20世纪60年代，在“U-2”击坠事件、古巴导弹危机以及塞浦路斯问题中，美国自身安全利益至上，必要时甚至不惜牺牲盟

^① Yunns Emre, *The Emergence of Social Democracy in Turkey: The Left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epublican People's Party*, p. 121.

^② Malike Selçuk Sancar, *Social Democracy in Turkey in a Comparative Setting*, p. 140.

^③ Sencer Ayata & Ayşe - Güneş Ayata, "The Center - Left Parties in Turkey", p. 225.

友利益的做法，成为共和人民党向中左立场转变的催化剂。1964年，塞浦路斯问题使土耳其和希腊关系恶化，土耳其政府决定进行军事干预，并在干预之前知会美国驻土耳其大使雷蒙德·黑尔，其带来约翰逊总统的信件^①，威胁和警告共和人民党政府，最终促使伊诺努放弃出兵塞浦路斯。约翰逊信件危机终结了土、美两国的蜜月期，土耳其民众反美情绪日渐高涨。^②共和人民党认为美国参与土耳其反政府活动是第三届伊诺努政府倒台的主要原因，因此接受国内左翼政治力量示好，转而寻求其支持。与此同时，土耳其开始重新审视和苏联关系。土、苏两国政府领导人频繁互访，两国关系缓和。埃杰维特曾明确表示，土耳其在20世纪中期受到全球四种左翼思潮的影响，即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左翼思潮、叙利亚和埃及的左翼思潮、社会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以及西欧社会民主主义运动。^③当然，埃杰维特并非完全认同社会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思想，只是意识到左翼思想的蓬勃生命力和号召力。

综上，二战后，土耳其的工业化进程和西方式多党民主制为中左思想意识发展提供了政治经济条件，凯末尔同质化民族国家构建造成的族群矛盾激化、进口替代工业模式的开启以及1961年宪法所赋予的相对自由空间导致严重社会分化和政治对抗，中左成为土耳其政党弱化意识形态分歧、解决现实问题以及寻求政治出路的“第三条道路”。^④

二 中左政党的意识形态转变及其政治实践

土耳其中左政党的意识形态变化与政党政治发展呈现互动态势。1961年以来，土耳其政党政治经受西方式多党制、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思潮的洗礼而呈现阶段性特征。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左政党依据其政治身份或多或少地形塑了土耳其政治发展模式。

^① See Lyndon B. Johnson and Ismet Inonu, “Correspondence between President Johnson and Prime Minister Inonu”,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20, No. 3, Summer 1966, pp. 386–393.

^② Sencer Ayata & Ayşe – Güneş Ayata, “The Center – Left Parties in Turkey”, p. 224.

^③ [土耳其] 比伦特·埃杰维特著：《中左——土耳其的一种政治思想》，徐鹏译，商务印书馆，1984版，第23页。

^④ “第三条道路”的提法系借鉴西欧范式的社会民主政党，指政党意识形态介于极左和右翼之间。

(一) 以鲜明的左翼政治主张参与土耳其政治经济变革 (1961~1980年)

在二战后的两极格局下,土耳其政坛呈现左右的显著分野。民主党和其后继者正义党坚持中间偏右立场,而共和人民党则从民族主义政党向中左政党转变。20世纪60年代初,共和人民党进步人士希望改变政治定位以应对政治经济变革。1965年议会选举前,共和人民党总书记伊斯梅特·伊诺努首次将中左作为选举口号。然而,仓促提出的中左口号并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明确的政治内涵,共和人民党成员甚至缺乏足够时间充分认识新的政治立场,更无法向公众渗透以寻求支持,使其得票率跌至50年代以来的最低点。^①党内针对中左意识形态产生激烈辩论,反对中左的政党成员出现两次退党浪潮。^②在1966年参议院补缺选举中,伊诺努没有提及中左思想,而是宣扬高生活成本和日渐增长的伊斯兰运动带来威胁,但未获成功。10月24日,共和人民党第18届政党会议召开,比伦特·埃杰维特领导的新改革者集团坚定支持中左路线;图尔汉·费齐奥卢(Turhan Feyzioğlu)领导的中间派“七十五人集团”反对中左意识形态。新改革者集团将共和人民党在此前选举中的表现不佳归咎于政党内部争端以及对中左立场的犹豫不决。^③最终,埃杰维特的中左意识形态占上风。“中左是这样一种立场和态度:它使人具有最高的价值,要求人的个性发展摆脱各种压迫和阻力,保证机会均等地调动人的精神和物质力量,拒绝同人类尊严、自由、社会公正格格不入的因素和方法,致力于以人道的方法建立一个人道的社会制度。”^④

中左意识形态是共和人民党为适应政治经济变革而提出的,是凯末尔主义和社会主义相互作用的产物,也是共和人民党努力摆脱精英政党形象的重要尝试。共和人民党利用中左意识形态与下层民众接触,得到来自较发达地区城市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支持。不过,土耳其中左政党并不具备坚实的工人基础,这是其在政治方面逊色于西欧社会民主政党的原因之一,也说明其并非是具有坚实阶级基础的政党。^⑤与此同时,中左政党不断调整政治宣传

① Ahmet Metin Oktay, *The Left of Center Politics in Turkey: The Republican People's Party 1965 - 1980*, Ankara: Bilkent University, 1998, p. 6.

② Ayşe - Güneş Ayata, "The Republican People's Party", p. 104.

③ Ahmet Metin Oktay, *The Left of Center Politics in Turkey: The Republican People's Party 1965 - 1980*, pp. 12 - 15.

④ [土耳其]比伦特·埃杰维特著:《中左——土耳其的一种政治思想》,第85页。

⑤ Yunus Emre, *The Emergence of Social Democracy in Turkey: The Left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epublican People's Party*, p. 224.

口号和施政纲领，推行跨阶级联合，以寻求更广泛支持。1968年6月2日，土耳其举行参议院补缺选举和地方选举，共和人民党的参议员席位从30个增加到34个，赢得色雷斯、马尔马拉和爱琴海地区的多数选票。共和人民党在大城市的得票率提升表明，中左意识形态发挥政治效能，取得阶段性胜利。1969年议会选举期间，共和人民党提出包括土地改革在内的一系列激进社会改革，埃杰维特甚至承诺“土地分配给那些耕种它的人，水分配给那些使用它的人”。^①然而，伊诺努明显的保守主义行为^②再次引发党内政治立场分歧，导致该党在此次选举中支持率下降。

20世纪70年代，中左政党迎来政治发展顶峰。1972年5月，共和人民党第五次特别会议召开，埃杰维特取代伊诺努当选为党主席。此后，共和人民党明确宣布其意识形态为民主左翼^③，加入社会党国际，政治实践展现灵活性。1973年议会选举，共和人民党获得33.3%的选票和186个议席。^④由于没有达到单独组阁的法定席位，共和人民党和民族拯救党组建联合政府。这一时期，联合政府赦免1971~1973年过渡政府期间被判刑的政治犯和普通罪犯，做出对塞浦路斯发动军事干预的历史性决定。^⑤这些举措大大提高了埃杰维特在民众中的受欢迎程度，中左政党的政治影响力显著提升。^⑥

1977年议会选举后，共和人民党获得41.4%的支持率和213个下议院席位。1978年1月，埃杰维特组建著名的“十一人内阁”，加强对外资石油、矿业公司的控制，推行新土地改革法案。不过，为满足政治压力集团的多元化诉求，埃杰维特被迫采取与左翼意识形态相悖的措施，如削减财政开支、允许里拉贬值，以换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但埃杰维特政府的经济政策无法在短期内达到预期效果，缓解经济恶化以阻止恐怖袭击

① Ahmet Metin Oktay, *The Left of Center Politics in Turkey: The Republican People's Party 1965 - 1980*, p. 17.

② 伊诺努此时的保守主义行为包括，发表传统演讲、赋予前民主党成员政治权利，甚至安排与前民主党领导人杰拉尔·拜亚尔（Celal Bayar）的和解会议等。

③ Malike Selçuk Sancar, *Social Democracy in Turkey in a Comparative Setting*, p. 143.

④ Binnaz Toprak, *Islam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urkey*, Leiden: Brill, 1981, p. 104.

⑤ 在塞浦路斯问题上，埃杰维特政府决心独立行动，向世界其他国家表明，土耳其不仅恢复其在民族利益问题上自决权，而且给予土族塞人摆脱希腊统治的根本权力。面对国际压力和被孤立的潜在可能性以及美国的武器禁运，1974年7月20日，埃杰维特派遣土耳其军队援助塞浦路斯岛上的土族人。

⑥ Malike Selçuk Sancar, *Social Democracy in Turkey in a Comparative Setting*, pp. 144 - 145.

和流血冲突的愿望落空，里拉贬值影响了企业的投资和利润收益，由此动摇了其执政基础。1979年土耳其议会选举，共和人民党仅获得27.4%的支持率，埃杰维特辞去总理职务，“十一人内阁”下台标志着中左政党政治巅峰时期结束。1980年10月30日，埃杰维特辞去共和人民党主席职务。1980年军事政变后，军方取缔所有政党，中左政党的政治实践暂告停滞。

（二）与右翼政党政策主张趋同且顺应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变革（1983~2002年）^①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自由主义和货币供应学派的影响下，土耳其重塑政治秩序和推行市场经济改革，军方主导的文官政府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宪法和颁布《政党法》《议会选举法》，以期重塑国家秩序。中左政党以社会民主平民党、民主左翼党以及共和人民党等名称出现。1983年5月20日，内德特·卡尔普（Necdet Calp）创立的平民党经国家安全委员会授权参与选举。伊诺努之子埃达尔·伊诺努（Erdal İnönü）创立社会民主党，但国家安全委员会否定其合法身份。1983年议会选举中，祖国党获胜，平民党获得30.46%选票和117个议席成为议会第二大党。^②1984年，卡尔普被迫辞职后，平民党和社会民主党合并成立“社会民主平民党”，埃达尔·伊诺努被选举为领导人。社会民主平民党成立后，埃杰维特的妻子拉希安·埃杰维特创立民主左翼党（Democratic Left Party），宣称采取不同于共和人民党的意识形态和组织机构。在1987年议会选举中，民主左翼党获得8.53%的选票，社会民主平民党获得24.74%的选票，为议会第二大党。^③此间，中左政党采取了不同于祖国党的政治立场，认为20世纪80年代各种资本将国家工具化，其目标并非为了国家发展和福利政策，而是以牺牲工人和农民、健康、教育、自然等为代价的经济增长；认为自由市场经济政策将会导致资本主义的狂热发展、腐败滋生以及土耳其美国化；坚持社会自由主义，将民族和宗教认同纳入政治话语。这体现了中左政党政治立场的新变化。

1991年，社会民主平民党与正确道路党组建联合政府，中左政党在政治

^① 1980年土耳其军事政变推翻了德米雷尔政府，取缔了所有政党。9月20日，以埃夫伦将军为首的军方主导组建由前海军司令布伦特·乌鲁苏将军任总理、技术官僚和退休将军担任政府部长的新政府，持续到1983年12月13日厄扎尔政府上台。由于该政府没有政党参与且由军方主导，因而中左政党政治发展不包含此段时间。

^② Malike Selçuk Sancar, *Social Democracy in Turkey in a Comparative Setting*, p. 147.

^③ Ibid., p. 150.

舞台再度活跃。1992年，共和人民党恢复建党，社会民主平民党随之加入。共和人民党与民主左翼党共同继承和发展了中左意识形态，但二者的经济政策略有差别。共和人民党的基本目标是在基于竞争规则的、有组织的市场体系框架内提供合理管理，提高生产力和经济效率，同时要求保护主义应限于那些在工业化和社会发展方面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子行业。^① 民主左翼党明确指出“提供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企业归国家所有”，“自然资源由国家经营，国防工业的所有权仍归于国家”。^② 埃杰维特反对国有企业的快速私有化，民主左翼党谋求私营和国有之间平衡的混合经济，主张社会保障和社会支出。^③ 有学者指出，坚持凯末尔主义的中左政党强调了下层阶级利益，预见经济发展，但没有将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和社会形态加以质疑。因此，他们对于统治阶级的立场仍然模糊不清，无法充分审视民主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内在动态关系。换言之，中左政党无法充分理解特定历史背景下社会民主背后的阶级关系。^④ 1995年议会选举，民主左翼党赢得14.64%的选票和76个议席，共和人民党赢得10.71%的选票和49个议席。^⑤ 在伊斯兰主义高涨的背景下，中左政党政治实践明显右偏，中左意识形态向中间靠拢。^⑥ 埃杰维特在政治伊斯兰问题上的灵活立场使其在政治伊斯兰和严格的世俗主义之间处于温和地位，“尊重信仰的世俗主义（Laicism）”政策是中左政党在政治实践中的创造性选择，为吸引温和的穆斯林选民的选票营造了更加开放的意识形态空间。^⑦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华盛顿共识引领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调整时期，包括土耳其在内的众多发展中国家为得到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不得不实行结构调整与改革。华盛顿共识以新自由主义

① Malike Selçuk Sancar, *Social Democracy in Turkey in a Comparative Setting*, p. 168.

② Ibid., p. 171.

③ Suat Kınıklıoğlu, “The Democratic Left Party: Kapıkulu Politics Par Excellence”, in Barry Rubin & Metin Heper eds., *Political Parties in Turkey*, London: Frank Cass, 2002, p. 17.

④ Gönenç Uysal, “‘Left-of Center’ in Turkey: A Critical Approach to the Impasses of Social Democracy”,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Administrative*, Vol. 2, Issue 1, 2018, pp. 38–39.

⑤ Sabri Sayarı and Yılmaz Esmer, *Politics, Parties and Elections in Turkey*,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2, p. 191.

⑥ Debbie Lovatt, *Turkey since 1970: Politics, Economics and Society*, New York: Palgrave Publishers, 2001, p. 103.

⑦ Suat Kınıklıoğlu, “The Democratic Left Party: Kapıkulu Politics Par Excellence”, p. 17.

为理论基础，注重经济发展的市场化、自由化及提升经济效率，而对社会公平与民生关注不足，由此深刻影响着土耳其中左政党参与国家治理的实践。中左政党在政治实践中表现出向全能型政党趋近的特点，减少意识形态包袱，寻求跨集团支持，甚至寻求以去阶级政治的方式迎合新中间阶级，但未能产生积极效果。在1999年议会选举中，共和人民党未能超过10%的政治门槛而止步议会，民主左翼党与民族行动党、祖国党组成联合政府。2000年底至2001年初，土耳其陷入严重经济危机，埃杰维特政府通过了社会民主主义者凯末尔·德尔维什（Kemal Deviş）提出的紧急经济改革方案，推行土耳其经济史上最激进的自由经济一揽子改革计划，^①包括银行改革、失业保险和扩大中央银行的自主权等。民主左翼党政府迫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要求以换取其经济援助，与该党的民主左翼路线明显背离。再加上这些经济改革措施未能在短时间内奏效，民主左翼党主导的联合政府难以为继，被迫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三）以反对党身份对执政党进行监督和挑战（2002年以来）

2002年以来，政党政治的多元化促使中左政党发生分化。2002年议会选举，选民因联合政府应对危机不力而投票支持其他政党，民主左翼党未能超过10%的门槛限制，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以下简称“正发党”）凭借压倒性优势获得34.28%的支持率和363个议席，巴伊卡尔领导的共和人民党赢得19.4%的支持率和178个议席。^②自2002年以来，正发党已经连续5次赢得议会选举，埃尔多安凭借一党独大的选举优势和个人威望确立新威权政治统治。执政党在身份政治背景下修改宪法、改组政府、弱化军方政治地位，严重挤压了中左政党的政治空间。民主左翼党的政治参与空间逐渐丧失，共和人民党作为主要的反对党引领中左政党的发展动向。2004年7月25日，民主左翼党第六次政党会议前，埃杰维特宣布辞职，副主席泽基·塞泽尔（Zeki Sezer）当选新主席。2007年议会选举中，民主左翼党和共和人民党结盟赢得20.85%的选票，民主左翼党在议会中获得13个席位，成为民主左翼党的最后辉煌。民主左翼党在2011年和2015年议会选举中支持率不到0.25%，2018年甚至失去参加议会选举的资格。

^① Sencer Ayata & Ayşe - Güneş Ayata, "The Center - Left Parties in Turkey", p. 226.

^② Huri Türsan, *Democratisation in Turkey: The Role of Political Parties*, Bruxelles: PIE - Peter Lang, 2004, p. 193.

2002年以来,巴伊卡尔采取与新左翼意识形态相左的立场,基于世俗主义和民族主义立场强调内政外交纲领^①,共和人民党呈现向右偏移倾向。巴伊卡尔试图以威权主义、军事主义和官僚主义原则重塑和教化土耳其社会,^②这并不符合民众的需求和愿景,因而逐渐失去民众和党内支持。2010年5月22日,凯末尔·克勒奇达尔奥卢(Kemal Kılıçdaroglu)成为共和人民党主席,承诺转变该党的政治纲领和实践。^③克勒奇达尔奥卢着手将其打造成为社会民主政党,以西方社会民主和政治自由理想并行的方式来治理复杂而多元的社会。^④2011年5月末,克勒奇达尔奥卢启动遍及全国的走访计划,表现出对普通民众的关切,以转变其不关注欠发达地区的传统政党形象。克勒奇达尔奥卢的政治路线仍具有显著的自由左翼特征,对现代、民主和世俗国家理念的坚持,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正发党政府的内政外交政策,加剧土耳其内部的分化。2018年,土耳其举行议会和总统“二合一”选举,共和人民党与保守的民族主义好党(Iyi Party)、伊斯兰的幸福党以及自由保守的民主党组建的“民族联盟”,挑战正发党和民族行动党组建的“人民联盟”,共和人民党赢得22.64%的支持率和议会146个席位。“反埃尔多安主义”原则将意识形态上相距遥远的政党团结在一起,标志着共和人民党在选举政治的轨迹和方式上明显转变。^⑤在2019年地方选举中,共和人民党赢得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市长职位而获得巨大突破。可见,克勒奇达尔奥卢领导的共和人民党不仅是

① Sinan Ciddi, *Kemalism in Turkish Politics: The Republican People's Party, Secularism and Nation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 99.

② Tanju Tosun, “The New Leader for the Old CHP: Kemal Kılıçdaroglu”, *Insight Turkey*, Vol. 12, No. 4, 2010, p. 34.

③ Koray Caliskan, “Towards The Third CHP: An Anatomy of the Main Opposition in Turkey”, 2014, <https://studies.aljazeera.net/en/reports/2014/04/20144108135189187.html>, 2021-04-13. 诸如艾申·乌伊萨尔等学者称克勒奇达尔奥卢领导的共和人民党为“新共和人民党”(See Ayşen Uysal, “Continuity and Rupture: The ‘New CHP’ or ‘What Has Changed in the CHP?’”, *Insight Turkey*, Vol. 13, No. 4, 2011), 但共和人民党的意识形态基础仍然是凯末尔主义的六大原则、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和安纳托利亚的历史、哲学传统,所以政党本身并无根本性改变。21世纪以来,土耳其政坛出现身份政治危机和意识形态界限的淡化,共和人民党的意识形态出现调整,不过就意识形态趋向而言仍属于中间偏左的政治派别。

④ See Koray Caliskan, “Towards the Third CHP: An Anatomy of the Main Opposition in Turkey”.

⑤ Max Erdemendi, “The Republican People's Party (CHP) is Complicit in the Erosion of Democracy in Turkey”, *Georgetow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ug. 6, 2020, <https://gia.georgetown.edu/2020/08/06/the-republican-peoples-party-chp-is-complicit-in-the-erosion-of-democracy-in-turkey>, 2021-04-11.

正发党连续执政的最大挑战，也给土耳其政党政治前景带来诸多不确定性。

土耳其中左政党约60年的政治参与实践表明，由于该政党阵营从未实现单独组阁，至多取得联合政府的相对主导权，且未形成长时段的主政态势，因此中左政党的政治参与程度与影响力呈现波动性变化特点。西方式多党民主制为中左政党提供了重要的政治空间，1961年宪法框架下政治环境的相对宽松促使中左政党意识形态转变，实现广泛的政治参与和掌控国家政权；1982年宪法框架下政治行为的理性收缩和中右翼政党的兴起，促使中左政党历经分裂而逐渐式微，政治参与度下降；进入21世纪以来，身份政治兴起促使政党意识形态界限淡化，共和人民党作为主要的反对党角逐政权，对政党政治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三 土耳其中左政党的发展困境

近代以来，土耳其人在吸收借鉴西方政党制度模式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现代政党政治制度。土耳其在现代民族国家主导政党政治发展的过程中，优先发展经济的话语压倒对平等分配的追求，阶级政治在政治社会生活中扮演次要角色，所以土耳其中左政党的政治纲领有别于西方国家的中左政党。中左政党经历执政党、参政党与反对党的身份变换，面对身份政治、内部问题以及民粹主义的挑战遭遇严重的发展困境。

（一）土耳其身份政治兴起影响了中左政党社会基础的稳定

20世纪60年代，欧美国家政治中出现突出和强调“群体身份”的现象，作为对社会多样性回应方式和态度的身份政治兴起。土耳其深受欧美国家影响，其身份政治主要围绕族群、宗教、性别等主题展开，引发政府、政党等政治行为体与各种身份群体之间的博弈，影响了中左政党的政治实践。

首先，身份政治兴起给族群和宗教政治带来更大的政治空间，但库尔德问题和阿拉维派问题影响中左政党历史走向。伴随着身份政治的兴起，“政治成为不断分化的身份群体争取承认和权益的活动，政党为了掌权通过笼络身份群体而重新布局选民基础，自由民主的共识因为过度的差异性诉求而走向分裂，政治极化成为西方民主国家的‘新常态’。”^①就土耳其而言，库尔德

^① 马涛：《身份政治与当代西方民主的危机》，载《当代美国评论》2019年第2期，第30页。

人、阿拉维派谋求摆脱弱势群体地位，争取更多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权利，包括中左政党在内的诸多政党积极参与解决库尔德问题和阿拉维派问题。20世纪70年代，库尔德民族主义者的政治诉求与左翼政治语境下摆脱剥削、贫穷和欠发达的话语产生共鸣，共和人民党肯定库尔德认同，主张给予库尔德人文化自治权，但这并没有满足库尔德民族主义者的要求，他们提出实行激进的政治和宪法改革，包括特赦土耳其工人党成员、与库尔德民族主义者进行和平谈判，以及在宪法层面给予库尔德人更多合法权利。^① 库尔德工人党的分裂行为加剧了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导致土耳其库尔德问题更趋复杂。20世纪80年代，在土耳其—伊斯兰一体化思想影响下，埃杰维特在1987年选举宣言中提出解决库尔德经济发展的措施——乡镇计划。民主左翼党反对库尔德问题的族裔定性，主张将其纳入与族裔无关的社会框架内。1990年，当库尔德人暴力冲突趋于缓和时，埃杰维特主张解散乡村警卫系统，武装部队撤离冲突地区。在1991年议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平民党对于库尔德人报以极大同情，强调民族分裂和身份政治之间的区别，力图将激进而好战的库尔德民族主义融入主流多党政治，与库尔德工人党达成选举协议。通过该协议，库尔德工人党成为社会民主平民党的议员代表。^② 由于库尔德民族主义议员在议会中采取好战且不妥协态度，被政府以勾结库尔德工人党的罪名逮捕和监禁，首次和平尝试以惨败告终，这使社会民主平民党流失了库尔德选区大量选票。^③ 1998年，耶尔玛兹—埃杰维特联合政府颁布促进库尔德地区经济发展的激励法（Incentive Law），但收效甚微。在1999年议会选举中，民主左翼党将库尔德问题作为土耳其广泛意义上的“民族团结问题”，在该党宣言及其他出版物中，都将库尔德问题界定为东南地区的“封建社会结构”问题。^④ 这与此后正发党的立场接近。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正发党“库尔德倡议”的实施，部分库尔德人转而投票支持执政党，共和人民党在库尔德人中间的支持率明显下降。

20世纪80年代，阿拉维派将政治伊斯兰主义的兴起视为对其信仰、文化

① Sencer Ayata & Ayşe - Güneş Ayata, "The Center - Left Parties in Turkey", p. 220.

② 这部分议员代表后来退出社会民主平民党并另建库尔德人民民主党（People's Democracy Party, HADEP）。

③ Sencer Ayata & Ayşe - Güneş Ayata, "The Center - Left Parties in Turkey", p. 220.

④ Ayşe - Güneş Ayata, "The Republican People's Party", p. 15.

甚至生存的威胁，因而将中左政党的世俗主义政策看作是保护其免受伊斯兰主义威胁的依靠，通过以族裔和阶级为基础的协会组织起来以表达身份政治诉求。90年代中期，阿拉维派对中左政党的支持略有下降。随后，中左政党采取了一些争取其支持的举措。祖国党与民主左翼党联合政府在土耳其历史上首次给予阿拉维派财政预算，阿拉维派在1998年获得42.5亿土耳其里拉的财政拨款。耶尔玛兹总理和埃杰维特副总理推动阿拉维派文化的专题研究。1999年议会选举后，民主左翼党联合政府宣称“我们政府将给予必要的重视来强化逊尼派同阿拉维派的兄弟情谊。”^①近年来，随着中左政党意识形态向右偏移，阿拉维派对共和人民党的忠诚度有所弱化，同其他选区一样对中左政党的组织机构、意识形态和选举表现日渐不满。^②但总体看，阿拉维派支持中左政党的力量不容小觑。尽管如此，具有工具性、排他性的身份政治可能助长极性对抗，诱发民粹主义极端行为，进而成为国家治理危机的重要根源之一。

其次，身份政治给女权主义带来新的政治空间，但世俗主义和伊斯兰主义博弈削弱了中左政党的政治影响力。世俗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的博弈是土耳其政治意识形态演进的主线，中左政党作为世俗主义意识形态的捍卫者，努力将世俗主义贯彻在妇女运动实践中，并得到妇女支持。20世纪70年代，当共和人民党向中左意识形态调整并建立新政党组织时，政党中的女性成员曾进行挨门挨户的拉票，以实现在议会和市政委员会中扩大妇女代表份额的政治目标。80年代，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以及大量妇女权利协会的出现，助力中左政党的政治参与。90年代，附属共和人民党的妇女组织成员成为世俗主义运动的狂热支持者，坚持认为公共生活的伊斯兰化是土耳其性别平等和妇女权利的根本威胁。^③21世纪以来，中左政党围绕头巾禁令存废问题与正发党展开激烈斗争，其对广大戴头巾女性的忽视和排斥导致广泛批评。尽管克勒奇达尔奥卢曾因对戴头巾妇女不友好将伊斯坦布尔阿维智拉尔（Avcılar）区政党负责人送往共和人民党纪律委员会问责，^④但这更多被视为拉拢妇女的

① 李艳枝：《土耳其的宗教少数派——阿拉维派》，载《世界宗教研究》2015年第3期，第155页。

② Sencer Ayata & Ayşe - Güneş Ayata, “The Center - Left Parties in Turkey”, p. 221.

③ Ibid., p. 222.

④ Şebnem Cansun, “The Headscarf Question in Turkey: the Examples of the AKP and the CHP”,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Vol. 6, Issue 8, 2013, p. 137.

策略，而非政治立场的改变。2021年3月20日，埃尔多安发布总统令宣布终止履行《伊斯坦布尔公约》，该条约规定缔约国有义务采取一切措施制止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以及任何形式的歧视。埃尔多安的这一决定引起共和人民党不满，该党妇女支部主席艾林·纳兹利亚卡（Aylin Nazlıca）请求“废除总统的决定”。执政党和反对党围绕世俗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的斗争仍将继续，共和人民党的女性基础仍将变动不居。

（二）土耳其中左政党的自身问题影响其政治实践效果

作为后发展国家，土耳其的政党政治并不完善。中左政党存在土耳其所有政党普遍存在的党内民主不充分、派系分离、权力斗争和腐败问题，这给其政治实践带来严峻挑战。

首先，中左政党内民主缺失影响其政治效能充分发挥。党内民主是保证政党活力和蓬勃发展动力的关键因素。受政党政治传统的影响，以共和人民党为主的中左政党呈现“领导者的稳定性”以及“领导人认同”的特点。^①由于传统政治习惯以及政党领导人的人格魅力，以伊诺努和埃杰维特为代表的中左政党领导人尽管保持了政党稳定，但个人主义倾向也带来党内分歧甚至分裂，阻止了党内民主原则的贯彻。日益壮大的党内争端被寄望由埃杰维特的个人魅力和中央集权的政党结构来遏制，共和人民党组织结构演变的主流是寡头制和中央集权倾向。^②对领导人过于倚重致使党内民主形同虚设，领导人更替导致内部分化。21世纪以来，丹尼兹·巴伊卡尔担任共和人民党领导人，强调党员对领导者不容置疑的忠诚，弱化地方政党组织权力，政党的组织权力从地方和边缘组织再次回到了政党中央和领导人手中。中左政党内部分歧导致党内反对派滑向分裂主义。^③加强党内民主是政党内部建设的关键因素，而这正是包括共和人民党在内的中左政党所缺乏的。

其次，中左政党内部的派系和权力斗争弱化了其支持基础。自伊诺努提出中左政治路线之后，共和人民党党内的意识形态分歧几乎贯穿始终，造成政党内部的混乱与分化。庇护主义是影响因素之一。土耳其庇护主义政治倾向使很多组织和个人将加入政党视为参与资源分配并获得优惠待遇的重要途径

^① Malike Selçuk Sancar, *Social Democracy in Turkey in a Comparative Setting*, p. 211.

^② Ahmet Metin Oktay, *The Left of Center Politics in Turkey: The Republican People's Party 1965 - 1980*, pp. 82 - 83.

^③ Ibid., p. 83.

径，在党内斗争框架内极易发展成为集团派系，派系之间壁垒清晰，并以外部因素如人身依附、部落形式以及族裔形式等强化组织内部忠诚。派系组织与不同的意识形态集团在政党内部共存，甚至有时会形成战略联盟，进而成为中左政党内部斗争的主导因素。^①以共和人民党为例，20世纪90年代以来分为三个派别：一是社会民主派别，该派受国际社会左政党和社会主义实践成功的启发，努力引导共和人民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二是民族主义派别，其批评社会主义倾向，提出追溯和延续历史传统的道路；三是介于二者之间的派别，该派认识到共和人民党转向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在社会经济问题上立场更接近于社会主义派别，但在身份政治问题的论争中倾向于支持民族主义派别。^②派别分立削弱了共和人民党的凝聚力。例如，2014年，民族主义派别政治新星埃米恩·阿尔克·塔尔汉（Emine Ülker Tarhan）离开共和人民党组建安纳托利亚党。^③2021年，共和人民党的前总统候选人穆哈雷姆·因杰（Muharrem Ince）辞去共和人民党职务，组建国土党（Memleket）。因杰在新闻发布会上宣称辞职原因是共和人民党内部缺乏民主，在利比亚、地中海东部和阿塞拜疆等问题上存在分歧，并认为该党已经偏离了共和人民党的传统原则。^④因杰的辞职进一步分化了共和人民党的力量，从而使中左政党的支持基础更加分散。

再次，中左政党面临的腐败问题影响政党形象和选民基础。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腐败问题是困扰土耳其政治经济发展的顽疾。议会、政府部门、市政机构以及其他地方组织机构中，腐败问题仍然存在。共和人民党在参政期间曾发生多起以权谋私事件和重大贪污案，政党形象严重受损而导致选民支持率下降。20世纪80年代，中左政党常常受到腐败指控，最广为人知的是针对伊斯坦布尔供水和下水道局的指控。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左政党政治地位下降，造成组织更加封闭、资源更加有限、分配更加困难，导致原本已

^① Ayşe - Güneş Ayata, "The Republican People's Party", p. 116.

^② See Yunus Emre, *The Emergence of Social Democracy in Turkey: The Left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epublican People's Party*, p. 402.

^③ Maaz Ibrahimoglu, "Troubles Brew for Erdogan as Turkey's Opposition CHP Wins Kurdish Sympathy", Feb. 18, 2021, <https://ahvalnews.com/turkey-politics/troubles-brew-erdogan-turkeys-opposition-chp-wins-kurdish-sympathy>, 2021-04-13.

^④ See Ali Kucukgocmen, "Former Turkish Presidential Candidate Ince to Split from Main Opposition", Feb. 8, 2021, <https://malaysia.news.yahoo.com/former-turkish-presidential-candidate-ince-131444141.html>, 2021-04-13.

经存在的腐败问题更为突出。党内私人商业利益的兴起则加深了政党成员和派系的对立，中左政党控制的国家部门和地方市政当局中的腐败，以及政党关系网络中的腐败现象，严重破坏了中左政党在土耳其民众中的形象。^①另外，中左政党内部分争夺重要资源和政治地位，胜者往往会给个人或者政治集团带来物质利益。在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同时，租金分配的政治化成为土耳其政治严重腐败的根源。大体而言，廉洁政府乃至廉洁社会的构建是土耳其民众的普遍愿望，构建廉洁政党是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客观要求，土耳其包括中左政党在内的所有政党应该通过建立法律和规章制度来强化廉政建设，最大限度防止损害民众利益的腐败行为发生。

（三）民粹主义与代议制民主的相互拒斥削弱了中左政党的内在张力

自18世纪以来，伴随着西方代议制民主的发展，民粹主义无论是作为政治辞令，还是作为一种政治运动，已经成为一种可行的、集体表达对“人民”的国内敌人怨恨的形式。^②晚期奥斯曼帝国以来，土耳其人仿效西方国家建立现代政治制度，民粹主义与代议制民主的博弈伴随政治现代化进程始终。

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以来，民粹主义即蕴含在凯末尔主义的六大原则形成过程中。作为一种反对阶级政治的政治战略，凯末尔主义旨在保证政治和经济独立以反对外国资本和帝国主义，并没有弥合晚期奥斯曼帝国以来精英与民众的二元对立，反而加剧了城市精英阶层和军队组成的世俗的、西方化的土耳其人和处于边远乡村和小城镇、固守伊斯兰传统的土耳其人的对抗。但是，建设现代化国家的热情和凯末尔威权统治掩盖了其他矛盾。

二战后，土耳其借助国际和国内形势，逐步建立起西方式代议制民主制度。“西方代议制民主看重选举形式，将复杂的政治民主简单化为一套选举程序，把一人一票、多党竞争当作衡量民主的唯一尺度，多数成为代议制民主游戏规则的核心要素。”^③“选举政治是西方式民主模式的关键环节，通过众多的程序性和技术性设置，依靠选举进入议会的政党与政治精英组成在既定任期内执掌国家权力的政府。这既是现实中代议制民主模式的理想逻辑，同时也隐含了精英治国的民主理念。其基本假设是，通过选举选择出有能力、

^① Sencer Ayata & Ayşe - Güneş Ayata, "The Center - Left Parties in Turkey", p. 226.

^② Nadia Urbinati, "Democracy and Populism", *Constellations*, Vol. 55, No. 2, 1998, p. 113.

^③ 柴尚金：《当今西方代议制民主的困境》，载《红旗文稿》2019年第4期，第36页。

负责任的政治精英，可以公正有效地管理国家或地区事务。”^① 民主党借助该制度模式结束共和人民党一党统治而上台执政。民主党以社会价值观的真正代表自居，宣称不会强行实施不受民众欢迎的改革，其提出的口号是“够了！轮到人民发言了”。此后，边缘阶层的土耳其人借助民主选举参与和掌控国家政权，逐渐赋予民粹主义新内涵，影响了多党民主制下诸多政党的意识形态立场。共和人民党向中左政党转变，意味着其摆脱反对阶级统治的传统话语，转向社会民主理想；而正义党的右翼民粹主义话语是其争取选民支持的重要抓手。有学者指出，“1962年至1976年间，民粹主义是占主导地位的政治范式，在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不连贯的就业制度、提高工人实际工资、扩大国家信贷和对农业生产者的激励等方面都有所体现。因此，民粹主义也是中右翼和中左翼政治集团之间的主要焦点。”^② 埃杰维特呼吁改变社会经济秩序，批评政党组织内部的传统精英主义和官僚主义倾向，标志着共和人民党的民粹主义诉求进入新阶段。他将“人民”即被压迫的工人、小农和小手工业者和那些“不代表人民”的人，即高利贷者、大地主、垄断资本家、买办以及非生产部门的人并列，呼吁共和人民党支持面临严重物质问题的人民。^③ 埃杰维特通过重塑“人民”和接近民众来争取更多选民支持，诉诸全新的民粹主义话语。

1980年土耳其军事政变后，社会民主平民党在1987年议会选举中使用民粹主义话语来解决经济问题，标志着对凯末尔民族主义和世俗主义话语的摒弃。20世纪90年代，左翼民粹主义话语被身份政治取代，而身份政治优先考虑土耳其民族主义和世俗主义以对抗库尔德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结果导致中左政党的民粹主义吸引力几乎消失殆尽。^④ 不过，由于代议制政府在解决公共问题上出现了功能僵化的困境，国家治理的无效性逐渐侵蚀了民主政治的正当性，为民粹主义的反建制动员提供了土壤，当然这里的民粹主义内涵发生变化。

进入21世纪以来，正发党借助保守的民主的意识形态和安纳托利亚地区企业家的支持长期执政，而共和人民党作为反对党角逐国家政权，中左和中

① 郇庆治：《当代西方政党政治的三重危机》，载《人民日报》2017年7月2日。

② Cemil Boyraz, “Populism and Democracy in Turkey: The Case of the Republican People’s Party”, *Reflektif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Vol. 1, No. 1, 2020, p. 35.

③ *Ibid.*, p. 36.

④ *Ibid.*, p. 37.

右翼民粹主义再度兴起，成为争取选民支持的重要话语。作为右翼民粹主义的代表，正发党极力将自身定位为“社会价值观的谦逊代表和国家仆人”，注重教育和健康领域。而共和人民党的克勒奇达尔奥卢则提出关注社会实际物质问题，诸如长期失业、腐败、贫困和不稳定的劳动条件等民粹主义主张，强调解决贫困问题和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保障。^① 穆哈雷姆·因杰作为共和人民党总统候选人竞选总统期间，提出自己等同于人民的民粹主义倾向话语，杰伊汉通过给稻草打捆的表演以彰显自己农民儿子的身份。这说明“和代议民主建构精英与大众合作机制的取向不同，民粹主义通过重构人民的政治内涵，从基本理念上挑战代议民主的正当性。民粹主义对代议民主谋求政治合作的目标表示质疑，指出国家存在大众与精英的区分，但二者是对立而非合作关系，强调政治过程中的对抗结构”。^② 这既代表了共和人民党民粹主义的新动向，也说明其与凯末尔精英主义基底背离而陷入矛盾。“民粹主义从话语上质疑代议民主的合理性，在实践上却需要通过代议民主建构的政治空间，表现自身的抗议姿态。这种目标取向与行为方式之间的冲突，显示了民粹主义的悖论性境地”。^③

吊诡的是，强调人民权利的民粹主义还主动呼唤权威。在代议民主陷入制度困境后，民粹主义者同样转向魅力型人物，期待由人民直接认可的领导者取代原有体制中的权力精英，但仍然无法回避政治精英的领导。“民粹主义希望强硬的富有魅力的领导人出现，以传达普通民众的心声和保障他们的利益。民粹主义者对于主张权力制衡和保护少数权利的自由民主/代议民主充满怀疑，他们支持大众民主、直接民主的政治体制，并寄希望于魅力领袖来激发普通民众的政治热情，使得疏离于政治的平民大众被纳入政治进程之中。”^④ 无论是坚持右翼民粹主义的正发党，还是坚持左翼民粹主义的共和人民党都希望出现魅力型领导人。土耳其政党政治的分化倾向和诸多新型政党角逐国家政权说明民粹主义话语逐渐失去民众的信任。许多民众认识到，“对于转型时期的国家来说，民粹主义的破坏性在于，它可能是民主崩溃和法治危机，

^① Cemil Boyraz, “Populism and Democracy in Turkey: The Case of the Republican People’s Party”, p. 39.

^② 高春芽：《民粹化民主的制度逻辑：包容与对抗》，载《学海》2018年第4期，第32页。

^③ 同上文，第34页。

^④ 林红著：《民粹主义：概念、理论与实证》，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49页。

以及阶级对立、精英与大众尖锐对抗的根源之一，它的非理性和不宽容会破坏民主政治的文化与价值基础。”^①由此，竞争性选举民主体制助长民粹思潮的危险蔓延，民粹主义崛起又凸显加强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紧迫性。

四 结语

中左政党的发展演变是土耳其政党政治变迁的缩影。从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土耳其从“同质的国家认同”向基于新宪政司法体系的“有差异的平等”的“多元民主”过渡^②，从国家主义经济模式向进口替代经济模式转变。在两极格局背景下，各种政治思潮相互激荡，共和人民党采取中左意识形态，完成从民族主义政党向中左政党的转变，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逐渐占据主导地位。随着以共和人民党为代表的中左政党登上历史舞台，其先后经历意识形态转变和参政地位的变化，实现从社会民主党向全能型政党转变。中左政党试图通过在土耳其植入新的意识形态和组织机构，以达到其适应迅速变化的国内外政治环境的目的，但并没有成功。这是因为中左政党看似合理自然的生成逻辑和演变轨迹凸显诸多问题：中左政党在公众舆论中远没有被认为是强有力的社会政策和福利国家的坚定拥护者，而在西方国家，社会政策和福利国家是社会民主党合法性和力量的主要来源。中左政党为了适应形势变化而表现出的开放性与政党本身的思想特质之间的矛盾，导致社会民主主义价值体系褪色而新的意识形态并未形成。中左政党为了追求选举结果趋于全能型政党而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传统政治特色，社会结构变化强化身份认同而造成的国家认同危机导致其难以应对民族、宗教和性别等社会难题。中左政党自身所固有的党内民主缺失、意识形态分歧、派系问题、权力斗争和腐败问题影响了其政治效能发挥和治理能力提升，民粹主义与代议制民主的相互拒斥增加了选举政治的不确定性，这都对土耳其政党政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责任编辑：樊小红 责任校对：詹世明）

^① 林红：《驯服民粹：现代国家建设的漫漫征程》，载《社会科学论坛》2013年第11期，第163页。

^② Seyla Benhabib and Türkiiler Isiksel, “Ancient Battles, New Prejudices, and the Future Perspectives: Turkey and the EU”, *Constellations*, Vol. 13, No. 2, June 2006, p. 230.